

● 要籍时评

解构本质主义与超越决定论

——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张松建

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于一九九一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和巨大的反响。这是一部试图重新塑造鲁迅形象的著作。它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再是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来考察鲁迅的小说与思想，而是“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内心世界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①。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对于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的深入的描述与分析。显而易见，汪晖所使用的研究视角、理论模式具有深刻的原创性，他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与中国大陆学术界流行了数十年的鲁迅观截然不同，因此在国际汉学领域引发持久而热烈的争议也就势所必至、在所难免

了^②。

一、传统鲁迅研究的误区

《反抗绝望》一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中国大陆鲁学界相沿成习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和决定论的解释框架，避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先定前提出发，而是尽量贴近研究对象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重建当时的语境，努力发掘出鲁迅精神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以此呈现鲁迅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原则等方面的文化心理内容。何谓“本质主义”？简单地说，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有着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本质，从而忽略了事物本

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特点。解构本质主义不是说取消掉一个事物的本质,而是要求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否认一个事物只有单面的、静态、不变的本质。至于决定论,则倾向于对于现象、事物进行“本质性的”、“规律性的”、“必然性的”界定,漠视偶然性和可能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可避免地具有目的论特征和宿命论色彩。本质主义和决定论实乃一体之两面:二者相互联系、彼此支持,具有极为密切的逻辑关系,可谓殊途而同归。在西方学术界,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遭到卡尔·波普尔、维特根斯坦、罗蒂等人的彻底清算^③,已经风光不再;但对中国传统的鲁迅研究而言,它们却是描述和解释鲁迅思想与文学的不二法门。

学者们一般公认,有三本著作可以标志中国鲁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陈涌的《鲁迅论》(1984);二,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5);三,汪晖的《反抗

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呐喊〉、〈彷徨〉研究》(1991)。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划分而并非精确的描述。因为在王著与汪著之间的过渡时期,就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这样观察敏锐的著作诞生;而在汪著之后,又有王晓明的颇有争议性的《鲁迅传》(1992)行世。为了说明汪晖著作的“范式”(paradigm)意义,有必要从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出发,不但比较上述几本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更要揭示深层的思维模式之差异。

陈涌从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出发,把原本非常复杂的鲁迅的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简化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线性进化过程,将鲁迅小说定位为“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试图从中印证中国的政治精英关于近代社会政治的一系列经典论述,最终把鲁迅塑造成所谓“民族英雄”和“阶级斗士”的光辉形象^④。不言而喻,这种简单化和偶像化的努力所导致

的直接后果是:鲁迅本体不仅被抽空了原本就有的复杂内涵与深层矛盾,并且无法挽回地对普罗大众失去了亲切感和感召力。针对于此,王富仁博士率先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革命口号,试图把理解鲁迅的重心从社会政治领域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他力图否定鲁迅研究的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从理性启蒙主义层面描述鲁迅小说和思想的意义,在宏观和微观方面进行了精彩而深入的分析,他的理论勇气和批判观点使这部著作至今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史意义。

必须承认,陈涌和王富仁的著作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对于鲁迅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任何视而不见或故意抹杀的态度都是非理性的表现。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无论是陈涌的“政治革命说”还是王富仁的“思想革命说”,尽管在基本结论和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但思维模式却如出一辙:二者都倾向于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普泛性的政治概念;而没有认识到:这些概念

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西方历史-文化语境,除非加以中国化的改造才能真正适用于描述中国的思想人物^⑤。除此而外,陈涌和王富仁对于“本质”、“规律”和“必然性”有一种过分的偏好。这种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要么全然无视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思想,以及他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内在关联,视之为与“本质”无关的东西而不予置评;要么虽然给予了一定的篇幅进行浮光掠影的论述,但却曲意解释为鲁迅在特定时期的“思想局限”和“历史性的误解”。与之相比较,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前进了一大步:他不从外在的历史情景变迁去解释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而是尽力贴近鲁迅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将他的文本中反复呈现的独特“意象”——例如,“希望”与“绝望”、“生”与“死”、“天上”与“深渊”、“黄金世界”与“现世”、“战士”与“无物之阵”等等——提炼出来,认真检讨它们所蕴涵的文化的、哲学的、审美的、伦理的含义。不过,钱理

群似乎将文学批评的任务理解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至于个人的情感因素介入过多,“了解的同情”终于淹没了应有的理性审视与批判立场。此外,他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心灵的辩证法”命题情有独钟,所以他在展示了鲁迅思想中的对立、冲突因子之后,又把这些在人本意义上无法调和的因素纳入一种井然有序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那样:“钱理群不辞辛苦地一层层打开了一把思想的折扇,目的在于向人展示他最后那一记漂亮的收合”^⑥。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以个人的主观体验和精神内省为特色,这种前所未有的研究视角使得此书具有迷人的思想深度。在他笔下,鲁迅头上所笼罩的神圣光环早已消褪干净,代之而来的是一个走投无路、处处碰壁、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饱受挫折的人生失败者的形象;一个年事渐长、愤世日深、对个人和人类的前途都充满怀疑和不信任感的伟大先知;一个

“二十世纪中国最苦难的靈魂”。值得玩味的是,作者有意在写作过程中介入强烈的主体性和当代性,以致于几乎把一部“鲁迅传”写成了自己的“心灵史”。

二、重新塑造的鲁迅形象

一言以蔽之,传统的鲁迅研究所设定的论题限制了自身的视野,而理论的建构又缺乏原创性,所以,出现“鲁学”研究表面上热闹非凡,而实际上并无实质性进展的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汪晖对此进行了自觉的理论反省,在《反抗绝望》一书的研究模式上寻求突破。他积极走出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解释框架,努力把历史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将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转移到主体方面。汪晖的研究观点是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其文学形态,而他的基本结论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彼此冲突的观点、情感和思维方式构成;这些矛盾的、复杂的、非统一的方面

在不同时期虽互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导致鲁迅的内心焦虑和灵魂分裂;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和谐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⑦。从这样独特的理论设计出发,汪晖深入揭示传统的鲁迅研究所忽视或漠视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反现代的个人如何被置入现代的历史?创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愿望为什么表现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现代工程?反传统的个人与传统的关系到如何?轮回的心理经验为何瓦解了进化的时间观念?鲁迅为什么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

思想人物却热衷于尼采式的超人、叔本华式生命意志、拜伦式的英雄、施蒂纳式的唯一者?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对于现实世界的诀绝?^⑧。这些问题反映了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而传统的鲁迅研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从这些“问题意识”出发,汪晖着重考察了“单元思想”在鲁迅精神结构中的发展历程,并且发现了一些阶段性特征:例如,1903-1924年间的“个人、自我及其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与确认”;1920-1936年间的“自我的困境与思想的悖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汪晖的鲁迅研究与别人有所不同,他研究鲁迅的起点是鲁迅在1907-1908年的思想,特别是鲁迅与施蒂纳、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家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表——易卜生、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安德列耶夫、厨川白村等人——的关系;他所着力分析的鲁迅文本——例如,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人的历史》等等——也是别人忽视的方面。

汪晖这部书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发现、对“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的分析。通过对于大量文本的独到诠释，汪晖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他的结论：“中间物”概念标示的不仅是鲁迅个人所处的“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这一概念的前提是对进步或进化的信念以及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它标志着对于自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洞察，从而使得鲁迅在观察社会事务时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定位和感觉方式。也许从个人的阅读经历可以证实这一点：我想，每个认真阅读过鲁迅作品的读者，都会直接而深切地感受到弥漫其中的那种黑暗的思想、幻灭的体验、无家可归的惶惑，对病态人心的异样敏感以及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

倾向，那种将过往的历史当作眼下的现实来体验，觉得历史只不过在上演一出轮回的把戏的深沉的失望感，但苦于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而此前的为数不少的鲁学研究者对此也束手无策。恰恰在这一点上，汪晖的超卓的判断力得以颖然秀出：他不仅对于这些非理性的思想因素和情感体验有着敏锐的感受，而且能够从鲁迅的文学世界中寻绎出一条潜在的思想脉络，将其抽象为思辩性极强的理论表述（conceptualization）——“中间物”意识，并且将这个“分析范畴”（category of analysis）置于二十世纪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的特殊语境中加以考察（contextualization），以期发现它在理解自我与世界、个人与历史关系时所体现出来的洞察力。非常明显，汪晖对“中间物”意识的阐发具有强烈的论辩性，所以它在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界不断引起讨论，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二届“亚洲国家现代化与民族性因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之一^⑨。

关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汪晖认为它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有内在的关联，而传统的鲁迅研究只是涉及了鲁迅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等理性启蒙主义方面，关于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于鲁迅的意义则绝少提及。应该说，这并非汪晖的个人创见。至少据我所知，在他之前和同时，美国的舒衡哲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重要方面；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专辟一章来讨论“鲁迅意识的复杂性”；夏济安提出了“黑暗的闸门”这个著名的隐喻；日本的山田敬三也曾以存在哲学来解释鲁迅思想；中国的解志熙更以探讨鲁迅与存在哲学的事实联系与文学影响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中心议题^⑩。但汪晖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以冲击一回应模式来解释鲁迅这种思想的外来渊源，甚至也没有兴趣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细致绵密的考证。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无足轻重，而是说汪晖的主要关注点是鲁迅精神结构及其

内在矛盾；这也不是说外在的动力是不重要的，而是说这种外在动力只有进入中国、成为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才是真正中国的问题，因而才能对中国历史显现出重要性。换言之，“必须把中国的思想与文学的发展视为人们对自身的（中国的、因而也是独特的）历史及其危机的回应和演变，而不是外在的动力结果”^⑪。从这个基本预设出发，汪晖首先将论述的焦点集中在《野草》这部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散文诗上，努力彰显其中与存在哲学相互发明的因子；然后，把论述中心转向《呐喊》、《彷徨》等小说文本上，检讨隐含在文字背后的“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与传统的鲁迅研究有所不同，汪晖在这里所使用的方法明显有竹内好的影子，也与解志熙的《野草》研究有近似之处：他不是就具体篇章作现实性的还原和实证性考察，而是把《野草》当作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去阐释。通过将具体的文学现象升华为抽象的理论表述，汪晖深入考察了《野草》中的一系列

重大命题：“无家可归的惶惑”，“走向死亡的生命”，“荒诞与反讽”，“自我与选择与反抗绝望”，“罪感、寻求、创造”，“超越自我与面对世界”，最终证实了“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之特质——一种不同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进化论等普遍性的意识趋向的东西，一种对生命的非理性的把握、一种属于人生“态度”范畴的精神现象^②。值得注意的是，汪晖并没有因此而把《野草》夸大为一部存在主义的作品。他正确地指出，尽管鲁迅对尼采、基尔凯廓尔这两位公认的存在主义先驱投以极大的热情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因而人们可以确立鲁迅与存在主义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但是，人们同样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野草》中的“我”及其内心体验具有深刻的文学特点，而不甚关心抽象的哲学命题，而且鲁迅也曾明确表示他丝毫没有将个人的生命体验夸大为世界命运的企图。我觉得，区分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否则，人们就有充足的理

由来质疑：在一个明显缺乏普遍性的“现代文明”的氛围中，仅仅凭借鲁迅与个别存在先驱的极为有限的事实联系，就将他的作品冠以“存在主义”的标签是否有些过于轻率了？

三、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

按照阐释学的观点，所有的解释都离不开解释者自身的历史性与个人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于鲁迅的看法都只不过是“我的”鲁迅观；而鲁迅作为一个已经沉入历史的思想人物，任何对于他的描述也只能属于一种“想像历史”的方式。不过，话又说回来，以上的分析并不表明汪晖的鲁迅研究已经完美得无可挑剔了。不言而喻，鲁迅复杂的精神本体和文学世界为各种解释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但任何一种解释方式在显示了理论优长之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

《反抗绝望》一书的研究思路有商榷的余地。简而言之，是关于思想与文学的关系

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取向问题。汪晖的一个理论预设是，作家的思想世界与他的文学世界有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他的心灵冲突与思想变迁必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而通过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精细解读也可以反观到他的思想世界的深层矛盾与发展变化。要之，文学可以视为思想的折射、投影与回声。因此，作者关心的主要是鲁迅的思想而非文学问题，文学只是提供了思想的脚注而已。从著作的篇幅可以看出这一点。全书分三章，共计350页，第一章分析鲁迅思想，有130页，第二章兼及思想与文学，有140页，第三章纯粹探讨“文学性”问题，有72页。看得出来，作者分析“思想”的篇幅大概210页，占据了全书的至少五分之三，而“文学”部分则不到五分之二。章节的安排不只是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它反映了作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思考。《反抗绝望》一书结构上的特点难免给人一种印象：汪晖似乎过于迷恋鲁迅的精神结构以至于忽略了文学自

身。

如何理解文学与思想的关系，这牵扯到文学理论问题。美国文艺理论家雷纳·韦勒克曾说过，文学的特性在于想像性、创造性和虚拟性，它虽然与社会、传记、心理与思想有一些联系，但只能看做是文学传统、作家艺术天才和想像力的结果，而不能想当然地把它化约为后者的产物。从社会、传记、心理与思想到最后的文学作品，其间必然要经过作家的刻意的艺术经营，这是一个包括了扭曲、变形、强化、弱化、夸大、掩藏等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文学与生活、现实与虚构之间始终有一条无法消除的界限。因此，即便是最真实的文学作品也不可天真地被当作传记或文献来看待，而那种试图从文学作品中发掘思想体系的做法也是靠不住的，往往犯下埃柯所说的“过度诠释”的错误^③。因此，韦勒克反复批驳洛夫乔伊的“思想史”方法，并将这一文学信念贯穿到他的全部著作中，包括素负盛名的《文学理论》、壁立千仞的八卷本《现代文学批

评史》^④以及《批评的诸种概念》^⑤。

坚持从文学与思想的对应关系出发来从事研究,必然忽视文学的性质与思想的特点,将作家本人的思想与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混为一谈。汪晖著作中有大量的类似论述——其实,全部的鲁迅小说都是这种态度的客观化,它们既是这种态度的表述,又是这种态度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鲁迅的形成正依赖于这种态度^⑥。

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鲁迅小说,包括那些这里没有直接分析的小说,都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的体现和结果^⑦。

对于鲁迅来说,这相互对立的思想因素在很长时间里,尤其是在《呐喊》《彷徨》时期,不是处于一个克服另一个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处于相互并存、相互否定、相互消长的状态。可以说,创作主体的多结构性和矛盾性正是鲁迅小说“悖论式反讽”的主观根源^⑧。

《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感想、追忆、观点乃至思维

方法(由小及大、由辫子问题到历史过程)、情感特点(冷中见热)、语言风格(冷话反语中见热情焦灼、苦闷愤激)都直接地呈现着作者的思想与心态^⑨。

对偶式主人公是和作者内在精神结构的矛盾性相联系的,小说人物的论辩性及小说内容的未完结性,恰恰说明作者内心的矛盾的尖锐性和未完结性^⑩。

对偶式主人公的对话过程是作者自己观察自己,同时又竭力表现并超越自己的过程,客观的、独立存在的、具有社会学和性格学的典型性的人物之间的论争关系,实际上又是创作主体在揭示自我、确立自我、超越自我的矛盾过程的一种双重思维,一种内在意识冲突,这种冲突是作家正在经历并且未完结的思想状态^⑪。

鲁迅小说的对偶式主人公的论争关系其实正呈现着鲁迅内在精神结构的论争关系。因此,这些小说的结构原则同时表现了作者内心世界的结构特点^⑫。

在我看来,汪晖对于结构

主义的方法论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以至太过强调鲁迅的精神“结构”对他小说的支配作用,同时又辅助性地使用鲁迅的小说文本来印证他的精神“结构”的印记,试图突出二者之间的“天衣无缝”、“若合符契”,这不仅忽略了思想与文学的各自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之中。必须声明:我不是全然反对思想史研究,而是对使用文学材料的合法性和解释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具体来说,此书的第一编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人的历史》等论文以及数量可观的杂文,这些材料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是非常合适的。第二编的一部分和整个第三编,就开始大量运用小说这种虚构性文体来作为立论的依据了。耐人寻味的是,追求文学研究的思想史取向在中国是非常入时的一件事。面对这样一股潮流,我想冒昧地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应当牢记

思想自身的特性及其与文学的复杂关系,那种试图对文学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做法,很有可能使文学史降格为思想史的脚步。

注释:

①②③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④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⑤⑥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见《反抗绝望》附录。

⑦解志熙:《鲁迅遗产的历史代价》,见《风中芦苇在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片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汪晖:《反抗绝望》原版自序。

⑨汪晖:《反抗绝望》新版自序。

⑩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⑪汪晖:《中国的“五四观”——兼论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前提》,见《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页228。

<p>⑫汪晖：《反抗绝望》之第二编。</p> <p>⑬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 <i>Theory of Literature</i>,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2; 埃柯 (Umberto Eco) 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 <p>⑭ Rene Wellek, <i>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i>, Vol. 1—8, New</p>	<p>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1992.</p> <p>⑮ Rene Wellek, <i>Concepts of Criticism</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p> <p>⑯⑰⑱⑲⑳㉑㉒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页 318、321、331、333、336、337、33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
---	--

